

歌剧剧本《老舍之死》诞生记

刘心武

一

北京东四牌楼北边的钱粮胡同，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一九五〇年，父母带着我和姐姐，住进钱粮胡同海关总署的宿舍大院，记得父亲告诉我和姐姐：“这胡同，是当年旗人领‘铁杆庄稼’的地方。”所谓“铁杆庄稼”，就是不用劳作，按身份就可获得的钱粮。因为住在那么一条胡同里，断断续续的，听父母讲了些关于满清八旗的事情。满族八旗兵入关的时候，说好听点是生气勃勃，说难听点是杀气腾腾，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在旗的人多是彪悍自傲的。但是，定都北京，按地分驻以后，皇帝对八旗成员采取包养起来的政策，钱粮胡同就是他们每月领取不劳而获的粮食及零用钱子制钱的地方，这样一代代传下去，就有很大一部分旗人，成了游手好闲之徒。到辛亥革命之后，失去“铁杆庄稼”，又无一技之长，不少旗人只好变卖家产混日子，凡能变卖的全卖光了，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干苦力糊口，有的甚至沦为乞丐，冻饿而死。父亲说他青年时代所接触到的旗人，大多礼数周到、身体羸弱、怯懦自卑。不过父亲又一再对我们说，辛亥革命时，已经实现“五族共和”，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既然咸与维新，五族之间应无争斗歧视，大家要平等和睦地共同促进国家富强，你们同学里不管哪一族的小朋友，大家都要一起好好学习、欢乐游戏。更何况，那时我和姐姐都转入附近学校插班，学校里飘扬着五星红旗，老师告诉我们中国的民族不止五种，有五十六种之多。但是在学校里，光看服装，大家几乎全一样，分不出谁是哪个民族。

姐姐大我八岁，她到附近什锦花园胡同的一所中学插班，我则到隆福寺小学插班。我们插班的时候，学校还是私立的，没过多久，北京市的所有学校就全收归国有了。我那小学没有改名，钱粮那所中学，改叫北京市女子十一中。有天姐姐放学回来，跟父母说，他们班上有个同学，是满族的，这个同学叫舒济。母亲听成了“书记”，颇感意外，“书记不是共产党干部里的领导吗？”经姐姐解释，才知道人家姓舒名济，因为是出生在济南，父亲这样给她取名。

又有一天，姐姐放学回来，宣布一条消息，就是舒济的父亲，是

个作家，叫老舍，学校已经通过舒济，邀请老舍到校给同学们做报告，听完报告，要写作文的。父亲听了说：“原来她是老舍的女儿啊！老舍是大作家啊！”姐姐疑惑：“她爸爸姓老，她怎么姓舒呢？赶明儿我要叫她老济啦！”母亲就笑说：“别胡闹！她父亲原名舒舍予，老舍是笔名。咱们在重庆住的时候，有几年老舍一家也在重庆。老舍的小说写得可好啦，我就喜欢他写的《月牙儿》！”父亲说：“他最出色的恐怕还是《骆驼祥子》，只是你们还小，恐怕还不大适合来谈。”听了这个话，我就千方百计找《骆驼祥子》，后来终于找到，背着父母读了，此是后话。

名作家到一所普通中学演讲，师生的兴奋可想而知。姐姐为把作文写好，“近水楼台先得月”，问了舒济好些问题，舒济只说：“听我爸讲吧。”讲完那天，姐姐满面红光回到家里，大家问她：“老舍讲得怎么样？”她说：“当然好啦。写作文不成问题啦。只是……老舍怎么拄个拐棍呢？”原来在她想象里，大作家，名人，应该从身体容颜上就完美无缺，因此当真实的老舍出现，表现出腿脚不利落，竟令她大出意外。我和姐姐一样，也是经过许多生活阅历之后，才懂得任何生命都不可能完美，即使是会被青史记载的名人，也总是将自身的善美，裹挟着人性的弱点以及外貌的瑕疵，展示于特定的时空中。

二

老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才从美国回到北京，一九五〇年就写出了话剧《龙须沟》，一九五一年搬上舞台，一九五二年拍成电影。我没看过《龙须沟》的舞台演出，但多次看过电影。少年时代看，关注点在喜欢小金鱼的小姐子身上，她陷进臭沟毙命，令我痛惜。青年时代看，懂得欣赏命贱子这个角色，这实际是个社会边缘人、弱者，但老舍从他身上挖掘出人性善美，超越意识形态，构成久远的审美价值。中年时看光盘，更加惊异“文革”时老舍投湖自杀后，《北京日报》竟出一整版批判文章，狠批在剧里喊出“毛主席万岁”的《龙须沟》为大毒草。生命，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所处时空的人质。绑架你的力量要将你“撕票”，那就没有什么逻辑可循，或者可以任意编造“逻辑”。“文革”中有人被揪出打为“现行反革命”，是因为有

人领呼“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时，他旁边有人举报他喊成了“万岁”，从而将他揪出质问：“为什么减少一万倍？！”其实他即使喊了“万万岁”，也还可以用别的“逻辑”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八〇后”“九〇后”注意：这是那十年里最常见的斗争用语）。

老舍剧作里的精品应属《茶馆》，一九五八年首演我就看了，如饮佳酿，醉中回味，有许多感慨却不能道出也不必道出。后来不知怎么停演了。一九六三年，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十三中任教，学校离中国京剧院所属的人民剧场很近，一日路过，忽然发现售票处在卖《茶馆》的票，一时以为是改为了京剧，过去询问，原来是北京人艺把话剧挪到这里来演，北京人艺自己的剧场则在演出反映“十三年”的歌颂性剧目。赶忙买了两张票，约当时在北京轻工业设计院的二哥一起来看。在人民剧场的这一版《茶馆》，跟过去版本比，有些改动，比如第二幕增加了学生在茶馆外游行，学生领袖站到茶馆门口板凳上激昂演讲的片段。当时也就理解，这剧里的三个主角恐怕都属于“中间人物”，全剧缺乏“亮色”，打点这样的“补丁”，可免“调子低沉”之嫌。那人在人民剧场的演出非常低调，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都无报道评论，只演了几场，就偃旗息鼓。后来知道，一九六二年已经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已经提出来文艺创作要“大写十三年”（即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新政，权下的成绩），那时连起初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电影《鲁迅传》也因非“十三年”里的题材而停拍，“十三年”外的《茶馆》的演出，真有些个“偷偷摸摸”的味道。

后来，一九六六年夏天，就爆发了“文革”，老舍不堪凌辱，投太平湖自尽。

三

一九八六年，是老舍投湖二十年祭。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一九六六年，我还是一个在中学里被吓傻了年轻教师（那时被划归为“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人”）。一九八六年，赶上了文革开放的好时期，竟成为了全国重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常务

副主编。当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还是王蒙，他一九六六年的时候还窝在遥远的伊犁农村，一九八六年时却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并到文化部任正部长。他几次到我家说服我，让我去接替他当主编，我终于答应后，一九八六年主持工作但不在杂志上印为主编，一九八七年再在杂志上以主编亮相。

我也算得“新官上任三把火”，说好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难听了是“鸡毛封蛋不自量力”，想立刻让杂志呈现出一种新锐的开拓性面貌。我将北岛的长诗《白日梦》刊发在显著版面；将高行健的短篇小说《给妈妈爷买鱼竿》作为头条推出；约刘绍棠写来风味独特的中篇小说《红肚兜儿》；又竭力推出广东青年女作家刘西鸿的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当时她还是海关的工作人员）……我想到二十年前老舍的悲壮辞世，心潮难平，我知道约写相关的追怀散文不难，却刻意要组来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

我首先找到了汪曾祺。汪曾祺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左右曾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和赵树理联袂主编的《说说唱唱》当编辑，他当然熟悉老舍。一九八六年的时候，人们已经淡忘汪曾祺是“钱袋戏”《沙家浜》剧本的执笔，他那时因连续发表出《受戒》、《大淖纪事》等秉承沈从文风格的短篇小说而广被赞叹，他自己似乎也定位于小说家而非剧作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完成了京剧剧本《裘盛戎》，自己很得意，剧团却冷淡，根本没有排演的打算，“不如写小说，没那么多牵制”，我就告诉他我找他正是来约他的小说，但“有牵制，是命题作文”。他一听有点不快，我马上告诉他，今年是老舍辞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无论如何要在今年夏秋祭悼一下，发点散文诗歌不准组稿，但我想请人写成小说，以小说形式来表现老舍之死，这样分量重一点，希望他无论如何支持下。他听后眼睛发亮，表扬我说：“你的想法很好。《人民文学》能发小说来纪念老舍，非同一般。你把这题目交给我，我责无旁贷。我应该写。老舍之死值得写成小说。”但是，他稍停顿了一下，却说：“难。这个题目太难。”我说：“您别打退堂鼓啊。我们等着您哩！”他终于答应“试一试”，又说：“其实你们可以多发几篇。也不

一定要我写的。”

那时苏叔阳已经写成了多幕话剧《太平湖》，并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我就又找到苏叔阳，跟他说：“你既然话剧剧本都写了，再写篇小说有甚难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间，我因短篇小说《班主任》，他因话剧《丹心谱》，成为引人注目的文艺新人，我们算是“同科出道”，一度来往较多，也很能同气相求，他对我的约稿热情允诺，表示一定写篇关于老舍之死的小说，以殒读者。

那时舒乙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现代文学馆馆长，有次遇上，我就告诉他《人民文学》杂志打算以小说形式来表现他父亲的辞世以为祭悼，他听了很兴奋、很期待。

汪曾祺和苏叔阳的小说稿陆续到达编辑部，我们编发了，但反响不如预期。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也未能成为一个保留剧目。老舍之死，应该以艺术形式呈现，既然有的作品不甚成功，那么，期待将来会有新的尝试吧。这个题材，成为我的一块“心病”。

四

二〇〇〇年我和妻子晓歌去了法国，住在巴黎朋友家，停留了颇长时间，还顺便访问游览了英国、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共十一国，非常开心。巴黎确是艺术之都。在那里，我们经历了满城歌声乐曲的立夏日音乐节，也进剧场看了演出，其中高行健特意请我和晓歌去巴士底歌剧院观看了古典歌剧《诺尔玛》，这是一个很少演出的剧目，其雄浑悲壮的风格令我耳目一新。

在巴黎，有机会接触到若干法国方面和中国侨居那边的文艺界人士。作曲家许舒亚那时侨居巴黎，他爱人在巴士底歌剧院合唱队里唱女低音，有天他们邀我们夫妇去他家做客，他说起一件事，就是巴黎每年都举办秋季艺术节，他已经连续几年为那艺术节创作作品，最近的一个创作是舞剧《马可波罗的眼泪》，演出后非常成功，因此，艺术节的主席，一位女士，就再跟他“订货”，要求他为下一届的艺术节写个歌剧，而且是“命题作文”，就是以“老舍之死”为表现内容。歌剧与舞剧的音乐创作又有区别，排演起来也更加麻烦，尤其是在法国演出歌剧《老舍之死》，用什么语言演唱？如果请中国演员来演，一般只能唱中文，法国观众听起来就



老舍

困难；如果用法国演员来表演，唱

法文，则又难以表达出中国风韵；而且，倘若用上合唱，则制作成本奇高，而艺术节为这样一个节目所能投入的资金，则是有限的，许夫人也特别强调，她们巴士底歌剧院排演《诺尔玛》，台上出现的群众演员（其实就是合唱队）最多时达到五十余人，巴黎秋季艺术节资金支持的都是新锐的小制作，如果许舒亚揽这个活儿，势必

要控制这出歌剧的规模，这就要求从脚本开始便“量体裁衣”。那天带我们夫妇去许家的定居法国的朋友，就鼓动我跟许舒亚合作，让我尝试着写个避免宏大场面便于演出的歌剧剧本《老舍之死》。倘是别的题材，我肯定一口回绝，但听说是《老舍之死》，我心动了。许舒亚听我的口气，是可以一试，很高兴。我们相约就此进一步沟通联系。

二〇〇一年许舒亚带着他的舞剧《马可波罗的眼泪》来北京演出，在二十一世纪剧场仅献演一场，他送了我好几张票，我和助手鄂力及编辑朋友一起去看，感觉他的曲风介乎古典与先锋之间，十分曼妙，而舞蹈者的诠释也十分贴切。我们约在中轴线的华北饭店大堂见面，我把已经拟就的歌剧剧本提纲给了他，讨论了一番。我觉得他似乎对我的剧本构想不怎么共鸣，但他还是鼓励我照自己的想法将其写出来。

二〇〇二年我写出了歌剧剧本《老舍之死》。我投给一家文学双月刊，被退稿。后来拿去给《香港文学》刊发了。散文家祝勇听到相关情况，觉得应该支持我的尝试，又拿去发表在他当时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丛书里，还特为我这个文本设置了一个栏目，叫

“非散文”。但《布老虎散文》印数不多，流布不广，许多人还是不知道我写了这么一个歌剧剧本。

二〇〇四年，许舒亚从傅光明编写的关于老舍之死的访谈录里，选取一些片断，谱写出了清唱剧《太平湖的记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首演。法国虽然既没有演出许舒亚关于老舍题材的作品，也没有演出我写的《老舍之死》，但有关机构还是赞助了出版商，请汉学家将我的歌剧剧本译成了法文，出了单行本，在此年的巴黎书展上，和我另几种密集译为法文的作品《树与林同在》、《护城河边的灰姑娘》、《尘与汗》、《人面鱼》、《如意》等一样亮相，我因此也又一次到了巴黎。

五

《老舍之死》在《香港文学》刊发后，我给住在同楼下面的舒乙送去。他第二天没有跟我通电话也没有上楼来见我，而是递来一封亲笔信：

心武兄：
连夜拜读了大作，感动落泪。谢谢你！而且为你高兴，特向你祝贺，是一个成功的作品。非常有新意，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悲剧，构思奇巧。

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挖掘，是个人道主义的张扬之作。

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已经不多见了，表现了你的勇敢和思考的锐利，最主要的是这种批判意识的独立性和不畏惧性，极为难能可贵。

通篇对老舍先生充满敬意、同情和惋惜，引出我许多痛苦的追忆和共鸣，夜间醒来，久不能眠……

我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觉得难演，是不是常规的舞台冲突、要求套不上，不知道一般的导演怎样去把握，好像朗诵更淋漓和痛快些。

知道你早有早睡习惯，不便电话打扰，特在上班前写此短函，表示我的欣赏和敬意。

……
问候歌好！

舒乙 上
二〇〇二.一.十一
我不知道是否能在某一天，我的这个歌剧剧本，能在舞台上呈现，哪怕演成话剧，或者仅是朗诵。

（选自刘心武新著《人生有信》，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三月版）

忆钱宁先生

李中铨

钱宁者，江浙人也，籍籍杭州，生于南京，少喜诗书，翻若文人。时华夏国忧，九州忧患，遂转志于土木之学。丙戌夏，先生远洋赴美，先习水利，后研泥沙，拜一代名师，获哲学博士。此时大洋彼岸，中华新生，辽阔大地，百废待兴。先生心向往之，不恋优裕，力破政阻，决别八年旅美生涯，举家回归祖国大陆。其父钱天鹤，乃国民政府农业次长迁台湾之高官，闻子归国，不胜唏嘘！

既归，先生旋赴黄河查勘泥沙，于秦厂水文站度三十三岁生日。是夜，蓝天静谧，月华如洗。先生心涛如潮，久未成眠，夜梦治河之梦，由是展展。徒步临水，遍访村民；随船勘河，细询河工；昼查夜录，不辞辛劳。数年间，借西学之法，参长河史料，融实地调查，张灵慧翅膀，著新论篇篇，齐聚黄河冲淤之变，现真知处处，辉映泥沙睿智之观。《黄河下游河床演变》随之付梓，若新窗辟于水利之学，似弯月初巡万里长河。

十年“文革”，举国浩劫，先生身处其中，亦莫能脱，“美蒋走狗”，罪似凿凿。先生虽曾彷徨，然志未离河。下放亦寻黄河岸，赴禹渡电站，筹港区沙安，改盐碱之地，成万顷良田。淳沦治导，不畏犯上，民间疾苦，历历品尝。时逢黄河三



钱宁

门峡、长江葛洲坝泥沙难解，先生临危受命，不计前冤，激情再燃。登沟头，攀崩梁，算泥沙，计水长，循天问地，探求良方。地貌接河流动力，数据比实地测量，先生大河寻梦发新枝，划中游多沙粗沙区为治黄锁钥。

环宇大势更张，神州喜迎开放。先生心志勃发，勤览中外文献，精研河流之变，欲树专业宏篇。孰料天嫉英才，恶癌忽至，令先生痛楚缠身。而先生成书做事之志，竟未消沉，反遇挫折

坚。病榻卧读，疗期疾书，与癌竞时，不舍分秒，期间先后著《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学》、《高含沙水流研究》等经典名作，中华泥沙之学迅崛全球。当其时也，先生重研亦重教，清华学子，广受熏陶，水利学界，获益良多，更创办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主编《国际泥沙研究》之英文期刊，治河治沙之短长，举世始得分享。

先生病重之时，曾约见水电部长钱正英。正英以为有后事相托，岂料先生所谈，皆三峡泥沙事，言自肺腑，理据条然，正英泪盈双眼。先生弥留之际，已不能语。正英三日两视，与先生言三峡，先生静然倾听，不时流泪。送别先生，八宝山相聚六百人之多；冬日寒风，先生骨灰悄然融入黄河。正英潜然，为之亲书忆文《生命就是奉献》。

先生归去迄今满廿五年。感曰：日月经天星辉淡，江河行地泥沙远。钱氏一族，名人盛出，“三钱”几无人不知，而先生则寂落凡尘，社会所知甚微。然智识之人，岂能忘却江河行地之利国利民之功臣乎？饱学之士，又岂能沦为奢谈空理、济世无功、追逐商利之浮萍乎？故先生之为人，惟世济用、至忠至诚至专者也，亦今之人楷模者、镜鉴者也。

是为此传，辛卯之年，暮春。

中国江南一带，有一个大家族：钱氏家族，堪称近代望族。钱家后裔在江浙地区分布甚广，我们熟知的三钱：钱学森属杭州钱氏，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建是其堂侄；钱三强乃湖州钱氏，其父是新中国运动著名人物钱玄同；钱伟长则是无锡钱氏，与钱钟书同宗，都称国学大师钱穆为叔叔。钱氏家族“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据考证他们是吴越国王钱鏐（852——932）的后嗣。近代以来，钱氏家族出现了人才井喷现象，遍布于世界各地，横跨各个领域。除上述三钱外，诸如钱其琛、钱俊瑞、钱正英、钱复、钱基博、钱文钟等均系钱氏。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人们都惊异于钱氏家族的才华，什么原因让这个家族如此枝繁叶茂，又硕果累累。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吴越王钱鏐贯彻“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奖励垦荒，发展农桑。特别是他在统治区内兴修水利，修建钱塘江海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回灌，方便船只往来。人称“海龙王”。在位四十年，战争很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其后的钱氏三代五王，都在祖上治世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变革，成了五代时期最为

富有的国度。赵匡胤吞并所有藩国，统一中原后，就把目光转到了吴越国上。他想挥师南下，统一中国。钱鏐的孙子钱弘俶遵循了祖训，带着全族三千余人赶赴开封，面见宋太祖，俯首称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纳土归宋事件。富饶美丽的江南河川，避免了一次血雨腥风的践踏。钱弘俶委曲求全的举措，让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统一。钱氏家族也得以保全宗脉，江南百姓更得以避免遭战争之苦，这无疑是由于钱鏐和钱弘俶的睿智选择，安宁了一方。由北宋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

军民以保家卫国之名做殊死之搏。有气节的战死沙场，无气节的做了安乐侯。如不存在民族侵略的前提，这种抗争的实质是钱氏百姓的感情捍卫一家之江山。

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弘俶其德大焉，他以钱氏一家之利换取吴越免受生灵涂炭，百姓依然安居乐业，功德不可谓不为厚。

钱氏立国，本因时逢乱世，民不聊生。钱鏐为保家园打出了一个吴越国。这位活了八十一岁的国王临终留下遗言：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

地，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虽要义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家 庭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矩。内外六门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勿饥饿济亲朋，举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古同烹），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社 会
信交朋友，惠善乡邻。恤寡矜

钱氏家族与《钱氏家训》

李承春

由于赵氏为帝，所以将“赵”姓排在第一位；将“钱”姓排为第二，都是因为当年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所做的抉择。

吴越国三代五王，尤以开国钱鏐、归宋钱弘俶功德卓著。特别是钱弘俶，他不比一般的亡国之君，没有陈叔宝的荒淫，没有李后主的懦弱。但只有他在北宋末发一兵一卒之时，纳土归宋。有如此君王，乃吴越百姓之福。我们习惯于歌颂那些誓与国家共存亡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但这个钱弘俶的功德确实还要大得多。请注意，吴越王始终未称帝，一直臣服于当时北宋中央政府，从后晋、后汉到后周，只是当时诸朝力量不足以统一。所以吴越归宋不存在民族问题，不能把钱弘俶等同于一般的投降派。历史上没有几个政治人物是主动走下舞台的，即便知道大势已去，也要倾国之力，号召

之。免动干戈。由此可见，钱弘俶的选择也是遵循了祖上的遗训，钱鏐高瞻远瞩，早就料到了这一天，告诫后人以民为贵，休为一家之社稷而动干戈。

钱氏功德之伟，历代帝王谁能与之比肩。其后裔繁茂，人杰辈出，乃祖上之阴功也。搜得《钱氏家训》（钱鏐著），其中不仅是教化之语，亦颇多人生智慧，愿天下人多多学习。

钱氏家训
一个人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中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拔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

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虽要义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国 家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取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虑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